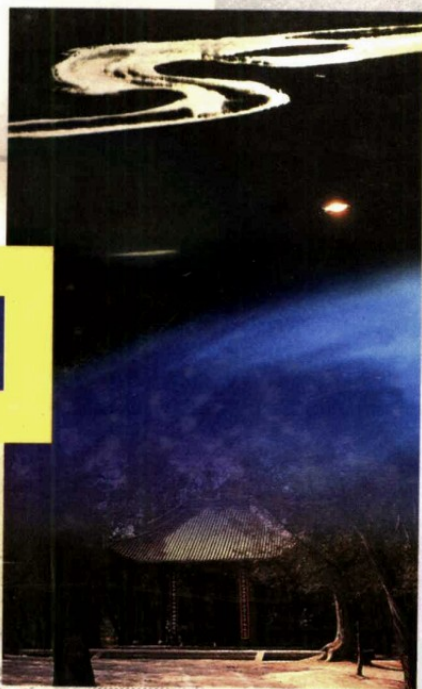


道藏与佛藏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胡孚琛 方广锞 著
汤一介 方立天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道藏与佛藏

胡孚琛 方广铝 著
汤一介 方立天 审定

新华出版社

道藏与佛藏
PDG

神州文化集成

京新登字 110 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道藏与佛藏

胡孚琛 方广铝 著 汤一介 方立天 审定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印刷公司监制

北京志诚文字图像处理新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95 印张

插页 2 张 106,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11-1837-X/G·677

定价: 7.95 元 (软精)

2.90 元 (平)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中国华诚集团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

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围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

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

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有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上编 道藏		1
一、《道藏》的由来和现状引言		1
二、早期道书的造作和自由造经时期		6
三、三洞四辅分类法及有关道经.....		14
四、南北朝及隋代道经的编纂.....		32
五、唐宋金元时期的《道藏》.....		40
六、明清的《道藏》和藏外道书.....		61
七、余论		72
下编 佛藏		77
一、佛藏源流.....		77
二、汉文大藏经.....		93
三、藏文大藏经		123
四、巴利语系大藏经		126
五、其他大藏经		130
六、敦煌写经		132
后记	李生泉	149

上编 道 藏

一、《道藏》的由来和现状引言

中国的道教和由印度传入且被中国化了的佛教，存在着某种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与中华民族的血缘、地缘、国情、民情息息相关。它从母系氏族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逐步演化为战国秦汉之际的方仙道、东汉以来的黄老道、汉末的早期道教和魏晋神仙道教。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为使中国人接受，不得不先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攀接某种关系。它先是依附神仙道教的方术布道，以后又依附老庄玄学而传。在后世佛道之争中屡兴大波的“老子化胡”之说，其实在汉代已经流传，那时的佛教徒并不见有谁出来反对，因而日本学者窪德忠博士屡屡著文论证老子化胡说原是佛教徒当时为布道需要自己首先制造的。南北朝时，从所谓“六家七宗”的格义佛教逐步脱胎出纯正的佛教，佛教的本来面目渐为人知，于是便要排斥老庄道家 and 道教的影响而自立，佛道之争顿时拉开序幕。道教中人根据早已流传的老子

化胡说，造出《老子化胡经》，贬低佛教；佛教徒则针锋相对地攻击道教，痛斥《老子化胡经》为伪经，并进一步提出除《道德经》外的所有道教经典都是伪经，怂恿信佛的少数民族皇帝焚烧道经。佛教在中国的盛传无疑大大地刺激了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自觉，促使道教以宗教素质较高的佛教为样板加速完善为教会式的宫观道教，藉以同外来的佛教抗衡。南北朝时，佛道二教各自出现了自己划时代的学者道安和陆修静。道安清算了格义佛教从而确立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立地位。陆修静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可和佛教史上的道安相比肩，他将早期道教和神仙道教发展为成熟的教会式宫观道教，整理了三洞经书并编出《三洞经书目录》。人们知道，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佛道之争中，佛教徒主要借判经诋毁道教，他们将当时翻译出的佛经皆称为释迦牟尼的真说，而将流传的道书统统打成“伪经”。道经目录是判经的第一手资料，相当于道经的户籍簿，从此一些古道经便有了存在的根据。

佛教自六朝以来所译佛经日益增多，至唐代印度佛经渐次译全，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代完成，形成世界上拥有经典最多的中国佛教。道教则经过六朝时期的自由造经阶段，道经和道经目录不断增广和完善，经过唐代的国教化使道教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道教经书也被国家统一编集成藏。唐代佛教的一切经书称为“佛藏”，道教收藏一切道书的总集便叫作“道藏”。唐玄宗时，大兴道教，于开元年间发使在全国搜访道经，充实《道藏》，并编定道经目录，名为《三洞琼纲》。当时《道藏》经书的规模古书记载不一，据《文献通考》记载总计三千七百四十四卷；《道藏尊经历代纲目》记载有道经五千七百卷；唐末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则在《太上黄箓斋

仪》等书中记载：“玄宗著《琼纲经目》，凡七千三百卷。复有《玉纬别目》，记、传、疏、论，相兼九千余卷。”道书卷数记载不同，多是由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例如，有以整部《道藏》的卷数统计者，有以其中道书的卷数统计者；有仅统计古道经，不计诸子、记、传、疏、论者；有兼统计“有目无本”的道经“虚目”者。所谓“虚目”，是还未出世的道经目录，这大概是在佛道之争中为丰富道经同佛教抗衡预留下的经目，给道教学者制造经书提供了方便。这种情况在佛教中也有，例如当时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记载《佛藏》的分类目录就有“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七录合计一万零四百三十三卷，但“有译有本录”实为五千零四十八卷。因而，《佛祖统纪》载“开元十八年，西京崇福寺沙门智升，进所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以五千零四十八卷为定数，敕附入大藏。”人们知道，道教的经书实际上是秦汉方士和六朝道士所作，但道教中人对此讳莫如深，却声称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灵宝大道君所说。佛教徒自信翻译出来的佛经全是佛陀真言，因而一再指斥道教托名元始天尊的经书尽是伪经邪说，掀起一次次关于道经真伪的辩论，利用判经打击道教。其实，佛经的数目远远多于道经，这么多佛经除去佛教方面自认为“伪妄乱真”者外，仅就全部从印度翻译来的“有译有本”的五千零四十八卷，也很难说全是佛陀所说。当时的民间说唱艺术家将“大藏五千四十八”的文句编进演唱戏曲，家喻户晓，无人敢说个“不”字。由于道经毕竟是中国本土产品，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实际上查无其人，太上老君也是春秋时老聃的神话，托名的经典可信度低。印度翻译来的佛经是舶来品，释迦牟尼的佛教神话无可追究，世人也从

不怀疑佛经的权威性。实际上佛陀如何能著述如许多经典？只不过佛经是印度的僧人制造的，道经是中国的道士制造的而已！道士们为了树立道经的权威性，仿照佛教释迦牟尼的神话创造出元始天尊等道教诸神，历代著述的道经多托名这些道教尊神所说，使这些道经中充满神怪之语并掺杂进佛教天堂地狱、三世轮回、因果报应、涅槃超度之说，反而给崇佛抑道的和尚抓住把柄。道教附会佛教的劫运说，声称元始天尊开劫度人，使道教的历史变成神话，道经的写作年代又无可考查，这反而降低了道经在世人心目中的可信度，再加上历代高道被捧为神仙而故意隐瞒其生卒年月，给道教史实的研究造成困难。这样，今天我们要对中国道教进行研究，必须首先考察道教的典籍，弄清《道藏》的由来和现状。

现存的《道藏》，编纂于明朝正统九年（一四四四），后至万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又刊成《续道藏》。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入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凡五千四百八十五卷。这部《道藏》以“三洞”（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四辅”（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分类。其中“三洞”各部又再分为十二类，计有本文类、神符类、玉诀类、灵图类、谱录类、戒律类、威仪类、方法类、众术类、记传类、赞颂类、章表类。这部《道藏》是我国道家 and 道教古文献的结集，同时又收入了和道教有关的《易》学、医学、古代科技、文学、地理、诸子百家的著作，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大宝库。早在清朝乾、嘉年间，《道藏》这部大丛书就引起了一些热心整理古籍的考据、校勘学者的注意。一些有重大文化价值的古书赖《道藏》得以保存下来，不致失传。《道藏》还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些古籍善本书，一些失传的古书也可以从道经的引文中辑录出来。例如毕

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于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在《道藏》中找到宋代的善本书《墨子》，校勘出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庄逵吉读《道藏》于南山说经台，发现其中的《淮南子》书比世俗流传的本子内容多十之五六，故于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刻印，为整理《淮南子》作出贡献。钱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于苏州玄妙观读《道藏》时发现邱处机弟子李志常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为研究蒙古史、西北地理和中亚地理的重要著作。后来，王国维先生为此作了校注。孙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还从《道藏》中辑出佚书《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匱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广黄帝本行纪》等，刊入《平津馆丛书》之中。老子的《道德经》一书，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也是在全世界译本最多的典籍之一。《道藏》中收入的《道德经》注本，既多且全，有四十六种。有题为南齐顾欢的《道德真经注疏》、唐末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宋代李元卓的《庄列十论》，皆幸赖《道藏》得以保存。《道藏》中的典籍不仅为国内学者重视，亦引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外学者的兴趣。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早在一九四三年就阅读《道藏》，利用其中的金丹术史料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后来收入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又对《道藏》中的内丹学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甚至将《钟吕传道集》和《悟真篇》译成英文，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近世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道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不少成果。著名学者刘师培、汤用彤、顾颉刚、翁独健等都阅读过《道藏》，为道教的研究开拓了道路。我们知道，道教经书年代不明，语涉怪异，研读起来如坠云雾，如辟荆棘，如饮迷药，如捋败絮，很难理出头绪，著成信史。为了搞清《道藏》的来

龙去脉，一些学者历年翻阅《道藏》，收集资料，排比推考，尽力研寻。其中，有中华书局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陈国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一九六三年又出版增订本）和日本道教刊行会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吉冈义丰博士的《道教经典史论》，堪称力作，较为著名。又有陈垣编纂了《道家金石略》于研究者颇有用处。其他如日本学者福井康顺曾著《道教的基础研究》（书籍文物流通会一九五二年版，一九五八年再版），对《道藏》编纂史和道书分类的研究方面亦有创见。国内学者胡道静等人近年来也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或著述。道教经书分类和《道藏》编纂史的研究无疑是道教文化研究中的奠基工作。

二、早期道书的造作和自由造经时期

自张陵于汉顺帝朝入蜀在公元一四二年创立天师道起，早期道教始告成立。它的前身是东汉时期的黄老道。东汉后期，黄老道徒多入山修道，习养生延年之术，那些记载各种修道方术的书，始称为道书或方书。这些道书，大多是战国至秦汉以来方仙道的方士造作的，托名黄帝、老子以为说。然而，早期道教以《太平经》布道，《太平经》已假托上帝、天师、仙人赤精子、真人等，可以说那时已出现了以神仙的名义造作的道经。魏晋时期，早期道教被镇压和分化，神仙道教形成，在神仙道教中，道书被称为“经”已甚普遍，且数量多如山积。这时黄帝、老子已被充分神化，道教的神仙谱系正在形成，方仙道、黄老道中遗存的古代方书通过师徒相传至魏晋道士手中，愈加珍秘，制定出师徒传经的宗教仪式。葛洪说：“道书之出于黄老

者，盖少许耳。率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①

“其指真之诀，或但口传，或不过寻尺之素，在领带之中，非随师经久，累勤历试者，不能得也。猥杂弟子，各随其用心之疏密，履苦之久远，察其聪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办，各有所授。”^②

我们将先秦至魏晋时期方仙道、黄老道、神仙道教承传的记述各类方技术数的书，称为“早期道书”。这些道书虽皆托名黄老，实为早期的方士、道士造作，其承传方式多采取师徒秘授式。至六朝时期，道教渐向成熟的教会式宫观道教过渡，这时由于道教发展的需要又出现造经高潮，三洞经书依次出世。六朝道士造作的上清经、灵宝经、三皇经多托名仙真口授，造作方法一般采取扶乩降笔的方式。这些道经在《正统道藏》中仍有保存，我们称为“六朝古经”。

下面，我们试图探讨一下道书的造作在文化思潮、民族心理上的某些背景。大致说来，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之间，有着某种此起彼伏、此长彼消的规律。春秋时期之前，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全被巫史控制，宗教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上古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崇尚女性崇拜的母系原始宗教文化首先出现，延续万年形成一种古老的传统。后世道家、墨家、阴阳家、神仙家、方技家、术数家诸派的文化，便是这种母系氏族的原始宗教古老文化传统的延续。夏、商、周三代进入父权

① 《抱朴子·释滞》。

② 《抱朴子·勤求》。